

# 方豪先生「重訂石濤生年」之商榷

李葉霜

本年四月號的東方雜誌上，刊出方豪先生「重訂石濤生年」一文，筆者認為大有商榷的餘地，爰撰此文向方先生請益，並求好「石」的朋友們指正。

方先生早於五十七年十月三日中央日報副刊刊出「石濤的生年」一文，對生濤生於一六四一之說有所評述，而主要是依據香港所出「藝林叢譚」（未署編者姓氏，據說已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六編，自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六年在香港陸續出版。）第四編鄭无悶「石濤書蹟跋」一文表示其卓見。綜合方先生的意見，不外下列幾點：

一、鄭无悶依據石濤「寄八大山人」函：「聞先生花甲七十四五，登山如飛，眞神仙中人，濟將六十……」（大風堂藏本），以及「石濤詩稿卷」中「庚辰除夜詩」序文：「庚辰除夜抱疴，觸之忽慟慟……今周花甲……」，以推定石濤生於崇禎十四年，或十四年左右之說，都不很精確。

二、有人根據錢牧齋（即錢謙益）「有學集」所載「送石濤上人」十四首絕句，其前序曰：

「石濤上人白廬山致蕭伯玉（即蕭士瑋）書，於其歸也，漫書送之。」詩後有識語，末曰：「辛卯三月蒙叟弟謙益謹上」。辛卯爲順治八年（一六五一），若依石濤生於一六四一之說推之，其時石濤只十周歲出頭，如何能從廬山遠行到廬山（常熟）爲人傳書？（筆者按：這是鄭无悶雖推斷石濤生於一六四一左右，而感到費解的問題！）因此有人認爲石濤的生年，雖有了「庚辰除夜詩」，仍不能解決問題。更有人因此懷疑「庚辰除夜詩」的眞實性。

三、以上二點，不全是方先生個人的意見，乃是一個綜合而成的意見。方先生跟着提出了他個人的意見，方先生說：「我對於年齡大小，不能遠行傳書一節，却另有看法；我認爲由一個虛歲十二歲的小沙彌石濤來傳書，在兵荒馬亂之時，或比年齡稍大的更易於完成使命。（筆者案：方先生已爲鄭无悶解答了疑問。）我懷疑的是錢牧齋生年雖有萬曆八年、十年二說，到順治八年已七十歲或七十二歲，決不至於對一個虛歲十二歲小沙彌自稱爲「弟」。（易言之：方先生對石濤生於一六四一左右之說，也不十分懷疑，但對

錢牧齋之對年少的石濤稱「弟」一節，則感到很費解，如果錢之稱「弟」一問題說得過去，他語氣之間，似乎尚可考慮接受石濤生於一六四一年之說。亦即是說，方先生臨文之時確亦曾有條件地接受了石濤生於一六四一之說——筆者）

四、方先生說：「如果庚辰除夜詩可疑，不論是由於石濤年小不能傳書，或是錢牧齋不可能對之稱「弟」，那麼整個『石濤詩稿卷』也不能無疑；同時大風堂本『寄八大山人函』也同樣不能使人信以爲眞。因爲庚辰除夜詩和寄八大山人函對於石濤生年的推算，有同樣的功用，頂多只差一年。所以一件眞，便兩者俱眞；一件假，便兩者俱假。否則，不會如此巧合」。筆者以爲對於前人的畫蹟或書蹟，有識之士的確能辨出其眞僞，歷來具有這種「巨眼」的代有其人，如米芾、項墨林、董其昌、高士奇等等。以近人來說大千居士、王季遷先生等也有其獨到之處，爲人折服。在國內的藝壇宿彥精於此道的也不乏其人。例如曾向徐復觀先生對大風堂藏本「寄八大山人函」及日人永源藏本「寄八大山人函」表示過意見的陳定山、彭醇士兩先生也非淺人所能企及。

無奈徐先生在先雖信大風堂藏本爲真，永源本爲偽，最後爲了尊重其「文字考證方法」却予翻案。而方先生這種「一件真，便兩者俱真，一件假，便兩者俱假」的論斷，似也未離開徐先生「文字考證」的藩籬。「文字考證法」在書畫真偽的鑑別上究竟能發生多大的效力，實在值得三思。

五、方先生的結論是：只憑所謂石濤「寄八大山人函」，不能斷定石濤的生年，亦即不能否認傳抱石所定生於崇禎三年庚午（一六三〇）說。方先生還否定了據庚辰除夕詩以決定石濤生年的價值。易言之，方先生仍然頗爲堅定地相信傳抱石的「一六三〇」說不錯。但方先生並未說出他相信傳說的來由。不過，筆者相信，方先生決不會盲目地依從傳說，或是感於傅氏對石濤研究用力甚勤而隨聲附和。

關於上述第三點，方先生所提出的錢牧齋在其詩序中對年少的石濤稱「弟」的問題，筆者在五十七年十月十一日中央日報副刊「再談石濤生年」文中已有所解說，同時徐復觀先生也有同樣的看法，所以方先生在「重訂石濤生年」文中說：「他們兩位對於錢牧齋『送石濤上人』十四首絕句前序中之稱弟，認爲是對蕭伯玉，與石濤年齡大小無關。對此，我非常感激。」那末，方先生既已認爲石濤年少傳書不成問題在先，今似又已接受了筆者與徐先生對錢牧齋稱「弟」的解說，照理方先生「重訂石濤生年」一文之主旨，似應以贊成鄭允閑所推「一六四一」說爲常態。想不到他所重訂的石濤生年，乃是依從鄭允閑所著之「石濤研究」（一九六一年出版）一書中的說

法。姑名之爲「一六三六年說」。（筆者案：鄭拙廬、鄭允閑，均爲鄭秉珊的筆名或化名）

鄭君在「石濤研究」中說：「歷來關於石濤的傳記，都沒有他生卒年月的記載。而石濤的畫蹟，至今也還沒有發見一幀上有某年某月時年幾歲的字樣。因此石濤的生卒年月，實在還是一個問題。俞劍華先生著『石濤年表』（一九四七年『草書』月刊第二、三、四期），傳抱石先生著『石濤上人年譜』（一九四七年單行本），均曾根據程霖生編『石濤題畫錄』所載的『重午即景堂幅花卉』中的詩句及跋語來確定他的生年生日。詩句是：

親朋滿座笑開眉，雲淡風輕節物宜。

淺酌未忘非好酒，老懷□□爲乘時。

堂瓶爛縷葵枝倚，奴鬢蕭條艾葉垂。

耆耄太平身七十，餘年能補幾篇詩。

跋云：『清湘遺人已卯薤賓於大滌堂下』。按己卯是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薤賓即五月，他們認爲石濤此時年正七十歲，以此上推，石濤實生於明崇禎三年（一六三〇）。此圖係畫端陽景物，據詩句中意義似記他七十歲做壽請客之事，因此又確定他的生日是五月五日。現在此說似已成爲定論，而爲某些書籍所引用了，如『畫苑掇英』和『中國美術史綱』等。

「但程藏『重午即景堂幅花卉』，我們雖不能看到，而日本人篠崎都香佐所藏的石濤『五瑞圖』，印入『宋元明清名畫大觀』

和『支那名畫寶鑑』的，却爲我們所習見。此幅上題的詩句和程藏本大體相同，只有第四句作『老懷聊樂爲乘時』，第七句作『見享太平年七十』，字句稍有出入。此兩圖畫得是否一樣，現在已不可考，但日本印出的是真蹟，却是無可疑的。可是這個影印本的跋語，實作『清湘遺人乙酉薤賓於大滌堂下』，仔細察看，乙字很清楚。顯然不是己字，西字寫成古文卯，却和卯（卯字篆體）字相像。按乙酉是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年）假如我們承認此詩是石濤七十自壽詩，此畫是七十自祝畫，那麼己卯和乙酉相差六年，這真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

鄭君在「石濤研究」一書所附錄的一張「石濤年表」，也就據此以推定石濤生於一六三六年。方先生「重訂石濤生年」一文，也就全盤接受了鄭君此一說法。同時指出傳抱石先生將「乙酉」錯認爲「己卯」；王方宇、方聞二先生將「乙酉」錯認爲「乙卯」。方豪先生顯然肯定地相信鄭君所說「……日本印出的畫是真蹟」，而且他這一判斷並非「以耳代目」，乃是「取臺大所藏昭和十一年十月日本大塚巧藝社發行原田謹次郎編纂『支那名畫寶鑑』，以放大鏡細審之……」之後的結果。

因之，方先生斬釘切鐵似的說：

「總之：祝壽也好，端午宴客也好；六十九歲也好，七十一也好，千真萬確的是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非己卯，非乙卯），石濤曾有詩句自稱七十。」

因之，方先生全盤接受鄭君所訂的「一六三六年」說，又據之以「重訂」石濤生於一六三六年。

鄭君在「石濤研究」中談到編列「石濤系年」時曾說：「現在爲了便利讀者的參考，姑且以『五瑞圖』題跋裡所說的乙酉年爲七十歲，卒年爲一七〇七年（據傅抱石濤年譜），把有年月的畫跋和史料，一一排列，系上年月，附在上編（筆者按「石濤研究」一書，分上下兩篇，上編爲「石濤的生平」，下編爲「石濤的藝術」）的後面，作爲傳略的補充。但這僅是一個假定，希望將來有新資料發現，來修正或證實這個假定。」鄭君這段話說得謙光可挹，也爲自己留有餘地。因之他後來撰「石濤書蹟跋」一文，就有條件地接受了「一六四一」年之說。鄭君當然想不到他前所假定的「一六三六」之說，會爲方豪先生所全盤接受。而且方先生還強拉鄭君對傅氏「一六三〇」說所說的「現在此說似已成定論，而爲某些書籍所引用了。如畫苑掇英和中國美術史綱」之語移接以指「一六三六」之說，來增強此說被人接受的程度。

方先生對「石濤生年」主張的轉變雖然略如上面所說，但不能據此以證明方先生的重訂石濤生年爲「一六三六」之說不足信。筆者以爲那幅吃緊的「五瑞圖」影本，在此有拿出來見世面的必要，（見圖一）方先生對此圖中屬於「畫」的部分，未加評論，對「字」的部分曾以放大鏡仔細看過，茲爲討論方便，特將「字」的部分放大刊出。（見圖二）現在我們再來討論這一五瑞

圖的「可靠性」究竟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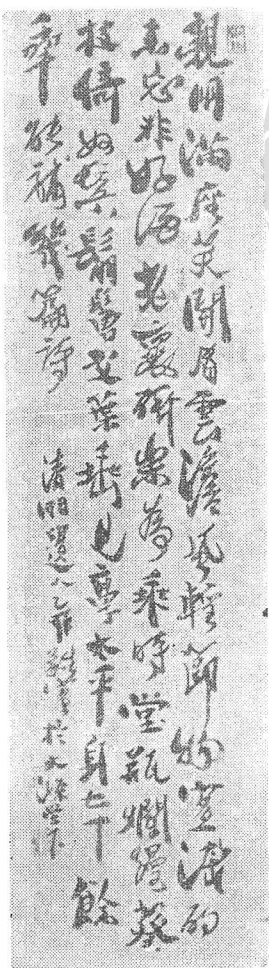
這幅「五瑞圖」，絕大多數人都只見到影本，包括傅抱石、鄭拙廬、方聞、王方宇等先生以

圖一、日人篠崎都香佐所藏的「五瑞圖」

及方豪先生和筆者在內。但另一好「石」之士吳問樓（阿問）先生却很幸運地見到「五瑞圖」的原蹟。他對此一原蹟的印象，也許能增加我們對



圖二、「五瑞圖」款識部分



此圖的了解。吳先生在其所撰「清湘遺人（石濤）的五瑞圖」一文中說：

「去歲端陽才過，有人飛函馳報說：『五瑞圖在此，火速來』，一夜不成眠，次日趕抵紐約布倫克林區，把讀良久，作筆記而還，經年相思，突然而遇，不容易的很。此畫略涉清湘生年，願就筆錄擇要繕出奉呈好「石」家參考用。」

「五瑞圖」，原京都篠崎都香佐氏物，戰後散出不明去向，往日託京都蓮實教授代為訪尋而不得要領，僅知畫是在大正末昭和初購下，其人兒孫輩現在東京，並不悉「五瑞」下落。全不想廿年後這「五瑞」再出，倒是歸旅日某華人手。

畫是中式舊裱裝堂幅，絹本水墨設色，畫心實測高一五七·四公分，寬九八·一公分（原日本尺碼為五尺一寸四分高，三尺二寸一分寬）。絹圓，緊細，未經捶熟，稍發墨，與一般清人用絹不同。畫面神氣完好，惟時有裂痕橫行絹身，用高倍放大鏡觀察，破損處似為某種尖形銳氣割傷的，並非絹質天然斷裂。本幅下半邊畫沒數頑石一座，呈靴狀（靴頭向幅左），其左右二端，各以濃淡墨皴染多重，略近山樵風味；石中段當是先打濕絹身，再以臥筆大力皴開；石的底處，借草叢蔽護，使的也是夾水夾墨濕筆法。石身虛着一短頸廣腹有足壺式大瓶，瓶身輕勾裂紋二、三道，口置艾、蒲、荷、葵、榴等五應節瑞品，花葉施色，是沒骨鈎勒路數

。幅左高頭，有行草書七律一首，並識語共四行六十九字，詩云：「親朋滿座笑開眉。雲淡風輕節物宜。淺酌未忘非好酒。老懷聊樂為乘時。堂瓶爛熳葵枝倚。奴鬢鬚艾葉垂。見享太平年七十。餘年能補幾篇詩。」

其下識云：「清湘遺人乙卯薤賓於大滌堂下。」全幅鈐印五方，計：朱文「零丁老人」方印、白文「東塗西抹」方印、白文「耕心草堂」方印（款識）；朱文「痴絕」長方印（引首）；朱文「舊年苦瓜」方印（壓角）。未見有他家題跋及收藏印記。

上面這段話，說得詳細清楚，對照圖片細看，確是毫無差錯，尤其是把五瑞圖的質地和情況加以說明，是我們從影本上無從得知的。跟着，阿問先生又說出了他對「五瑞」的看法：

「就畫而言，觀其落筆先後，可知是先作花葉，再因花作瓶，因瓶作石，然後補草。五種花葉的搭配及用色尚屬自然，偏左使重墨點出蒲葉以與艾草間錯，偏右畫葵花一向一背兩朵，正與下方盛放紅榴相呼應，不過石榴下那梗光禿殘荷則個敗筆，造形劣，用筆也臃腫不堪。勉強說來，五瑞中只榴花較近清湘原本面目，譬如，於花萼葉柄處每見以焦墨乘絹濕時着緊一提，是為清湘和尚揚州期作品中尋常見手段。此外，不論分枝布葉勾脈設色，都與清湘不同，至於在花瓶上以淡墨染出光影和分別陰陽的做法，我見聞有限，此實為僅見的例子。花、瓶、石三部份，線條輕薄飄浮，補筆特多；石之上點

苔類繁，大多聚集兩端有輪廓線處及石脊上，略加分類，可得圓點、鼠足點、瓜子點三樣式，清湘真蹟中，苔點是一最具精神處，後人作偽，多於這地方走漏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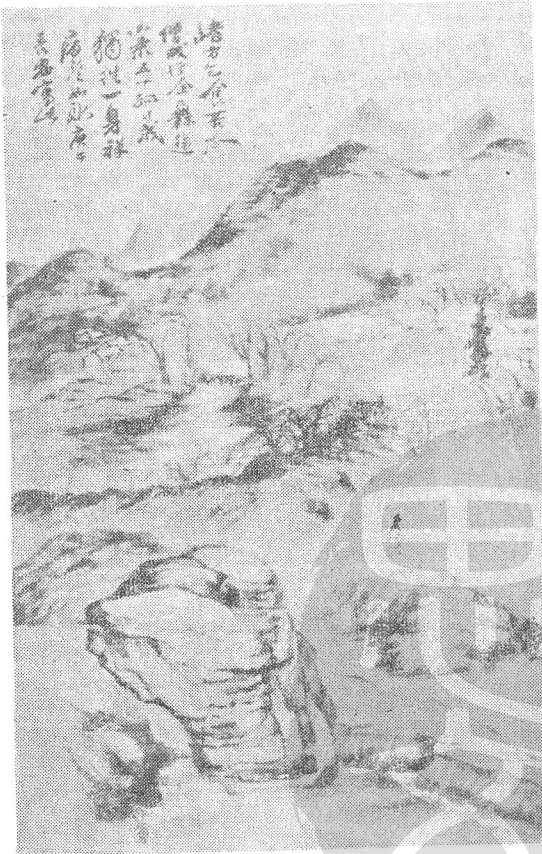
就書法論，此六十九字是糟不可言，如避而不談好壞問題，則六十九個字中也有一小部分帶着清湘和尚模樣，如第二行之「忘」字，第三行之「見」字；又與一部分傳世的「蔬布簾紙」作品上題字偶合，這樣看來，可想見這一自署「清湘遺人」款者，對清湘字體或其某種程度之認識，亦即約略掌握清湘行草字之部分肩架結構特徵，依樣施出存心亂真，無奈他自身對書道修養有限，所以此數十個約四公分見方的「大」字，反十足表明此君對書法藝術表現力之貧弱及趣味之低下，又可了解此君對清湘筆墨間之特殊氣質、神彩、個性全然無所知曉，這一點，充分說明此自署「清湘遺人」款者，事實上對清湘和尚字從未痛下苦功，細心體會過（因此「五瑞圖」非是大風堂出品物）！我個人意見以為這六十九個字並非有所依據刻意臨摹出來的，恐怕要出於「自運」之可能性為大。」

以上是吳先生對「五瑞圖」原蹟之畫及字的印象，另外他還論及印章等項，在此不必多引了。總之，吳先生看了「五瑞圖」原蹟之後，肯定的確定其為偽蹟。而非非概括的說「一望即知係贗物」。（此乃徐復觀先生對「石濤五十孤行冊」的評語）所以很值得我們這些從未見過「五瑞

圖「原蹟的人作為參考。

筆者之確認「五瑞圖」不是石濤所作，也還有個原因，且將「五瑞圖」上的六十九字端詳一下，（見圖二）別的字不談，請讀者將眼神落在要命的那個所謂「乙𠄎」紀年上，這一「乙𠄎」的「𠄎」字，既像「卯」，又像「酉」的古字「𠄎」，既非「卯」，也與古寫的「酉」字「𠄎」有異，乃是寫成「𠄎」的模樣。按「𠄎」字，據說文解字注「𠄎」，古文酉從𠄎，一以閉之。𠄎為春門，萬物已出，𠄎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一象也。但、並非「𠄎」，因為「𠄎」旁，實即「邑」字。須知寫古體字，是絲毫都不能隨便的。近人包明叔先生在其「說文部首通釋」一書中

圖三：作者所發現的足以證明石濤生年的畫冊——「五十孤行冊」



說「酉、𠄎形雖不同，其義則同，劉與柳普通人叫做卯金刀劉，木卯柳，其實俱是誤𠄎為卯，如果認真寫起來，都該寫成劉、柳。」他又說：「中國字雖康熙字典統一形式，考試時不容亂寫，但是文人學士，以能寫古字為淵博，所以弄得後人淺學者寫起字來，腦筋中影響龐雜，往往寫出四不象的字來，可以說是虛政。」作「五瑞圖」的這一「清湘遺人」，想必也是一位淺學者，所以才寫出這樣一個四不象的怪字來。

此一怪字既然「四不象」，說它是古寫的酉字也好，說它是今字的卯也好，似乎都各有道理。只是傅抱石先生的確把此一怪字之一字「乙

錯認作「己」了。

又據「說文

通訓定聲」：「

𠄎，說文以為酉

之古文，按西、

𠄎截然兩字，今

別分為正篆關戶

為𠄎（卯），關

戶為𠄎，從𠄎而

關其上，指事坐

字從此會意，如

𠄎、柳、樞、𠄎

、劉……均從𠄎

聲。

準此，則𠄎

、酉在用法上還

今名家的

書畫題識

上以及往

古的碑誌

上還沒有

見到將「

酉」寫成

古文「𠄎

」的。實

則「酉」

字亦是一

個古字，

在古金文

字上常見

寫成酉或

𠄎。石濤

對金石書

法均有其

造就，在「清湘書畫稿卷」及「梅花圖軸」上，

內中之柳字却正確地寫成「柳」。但遍查石濤落

「酉」年地支之作品，從未見有將「酉」字寫成

「𠄎」字者。如乙酉年所作「三絕圖」及「為嘯

公大師所作詩軸」。（均見密歇根大學編印的道

濟畫展目錄，方先生或有此書）。

圖四：「五十孤行冊」

題識部分



即此一「四不象」的怪字，已經足以認定「五瑞」不可靠，何況怪字非僅此也，請看「老懷聊樂為乘時」一句中的「聊」字，其草法也足以令人歎為觀止的。石濤丁丑年所作的閩江圖的題詩中有兩個「聊」字，（見「道濟畫展目錄」一

一九頁，不妨對比看看，他如「樂」字，「葉」字也太離譜。筆者以為傅抱石先生當年，不採「五瑞」為據，而寧採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石濤題畫錄」的著錄以推斷石濤生年，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的。傳說是否足信，論者已多，今方先生又已放棄原來的支持，本文不予討論。

至於筆者個人，仍相信石濤生於一六四一年，或一六四一左右之說。此一信念，並非全信大風堂藏本的石濤寄八大山人書，也不完全依靠石濤庚辰除夕周甲詩稿。此二者討論之文字已經不少，在此略過不提。筆者所依據的是「石濤山水冊頁」中的「五十孤行」頁。這一冊計八頁，為廣東嶽雪樓孔廣陶所藏，孔又號鴻昌、少唐、少唐居士，南海人，為清咸同間的著名收藏家。此冊現藏為廣州市博物館。我所見到的是一九六三年宣紙精印的影本。（影本中的畫幅長三十二公分，寬二十公分有奇）這種影本比一般珂羅版的影本為佳，與複製品相近。「五十孤行」是其中的一頁。筆者曾於五十六年據此撰成「石濤生年的新憑證」一文，刊出於是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中央日報副刊。茲將此圖製版刊出，以供參證。（見圖三）此頁上題記云：

諸方乞食苦瓜僧，  
戒行全無趨小乘；  
五十孤行成獨往，  
一身禪病冷如冰。

庚午長安寫此（此字下蓋有「晴尊者」長方印）

這一題記（見圖四）有「庚午」以記作畫的

年代，「五十」以記作畫時作者的年歲，用以推斷石濤的生年，算得上一件可貴的資料。按庚午是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是年石濤北行在長安（北京）。今以庚午年（一六九〇）石濤五十歲倒推四十九年，應為明崇禎十四年辛巳（一六四一），是年乃石濤出生的年代。此一「五十孤行」冊，徐復觀先生曾見到過一張照片，他說「一望即知係贗物」。（按徐先生與方豪先生多半着重所謂「書畫的文字考證方法」，他們對書畫鑑賞的能力究竟到了何種程度，是很難測知的。）吳問樓（阿問）先生的意見則與徐復觀先生相反，他認為「五十孤行冊」與「庚辰花甲詩」是真蹟的可能性極高，「冊」尤其比「詩」更可靠。吳先生認為「庚午」和「五十」二者之間的關係是不確定的、非直接的，有伸縮性的。筆者對此亦表同意。總之，如此「五十孤行冊」確認為真蹟，則石濤庚午年為五十歲上下是可以確定的，再益之以「庚辰花甲詩」等材料，石濤的生年就呼之即出了。吳先生是我們好「石」之士中的幸運者，他曾協助美人艾瑞慈教授籌辦一九六七年密歇根大學「道濟大展」，也是「道濟畫展目錄」的編纂人之一，確曾親手親目「接觸」過石濤的許多真蹟以及偽蹟。從他所撰的關於「石濤」的文字中，知道他對大千居士非常尊敬，但對大風堂藏本石濤「寄八大山人函」則因尚有真偽之辯，仍持保留的態度。從這些地方至少可以看出此君尚非一般的「苟同」者可比。

方豪先生「重訂石濤生年」文中，曾涉及幾個與石濤生於「一六四一」說有關的疑問，這些

疑問包括方先生個人的，以及轉述徐復觀先生或鄭君的。茲就淺見所及，逐條簡答如次。

一、方先生說：按此一說法，（指「一六四一」說）順治八年時，石濤只十一二歲，不可能從廬山遠行至廬山，而師兄喝濤伴行之說又無切實根據，已見前述。

解答：①方先生曾說：「我對年齡大小，不能遠行傳書一節，却另有看法；我認為由一個虛歲十二歲的小沙彌石濤來傳書，在兵荒馬亂之時，或比年齡稍大的更易於完成使命。」筆者也同意方先生這一看法。②廬山至廬山（常熟），路途並不遠，交通亦甚方便，只須從九江（約距廬山二十華里）搭船，沿長江順流東下，經過蕪湖、南京、儀徵、鎮江等地就到了常熟。（常熟雖不在長江邊，却離長江不遠）。十一二歲的小沙彌也不難做這樣的旅行。③師兄喝濤伴行的推斷，詳見筆者「石濤、喝濤及其他」一文，載於大陸雜誌第三十七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文中乃採舉三隅以反一隅的方法，而不是舉一隅以反三隅。可供參考。④鄭君「石濤研究」中也曾說：「我曾有這樣一個猜測：石濤在國破後託內官存活，也許這喝濤就是內官之一，因避危險而一同做了和尚，並浪遊四方，幾十年不曾分離。表面上是師兄弟，實在是石濤唯一的保護人呢！」方先生是很重視鄭說的，特錄出以供參考。

二、方先生說：錢牧齋固然可以對蕭伯玉稱弟，但如何解釋對十一二歲的小沙彌石濤稱「開士」？「石濤研究」的作者鄭君亦說：「以十一

二歲的少年，能和蕭、錢兩大老做朋友，這是不可想像的事。

解答：①據辭源「開士」佛家語，本以稱菩薩。謂能開衆生信心也。前秦苻堅。賜沙門有德者號曰開士。故亦爲和尚之尊稱。見「釋氏要覽」。又「李白贈僧詩」：「衡岳有開士，五峯秀眞骨」。可見「開士」一辭，引用爲和尚之尊稱由來已久，並非什麼了不起的稱謂。亦猶如蕭伯玉詩中之「石公口喃喃」，對石濤竟稱「石公」呢。亦足見昔時對人尊稱，乃有學養者之一種習慣。錢牧齋亦稱石濤爲「石濤上人」，「上人」亦和尚之尊稱。以對人的稱謂而論，今人似不如昔人的寬厚。②石濤以十一二歲的少年，能和蕭、錢兩大老做朋友，是有其淵源的。石濤乃靖江王朱贊儀之十世孫，而蕭伯玉的五祖蕭用卻爲靖江王之長史。石濤去見錢牧齋，錢亦知其爲勝國王孫是可以想見的。觀其「送石濤上人」十四絕句中「兵塵不上七條衣，刀劍輪邊錫杖飛。五老棲賢應有喜，昆明規外一僧歸」一首即可明瞭。故石濤之與蕭、錢兩大老的交往，非平常的「小沙彌」與「大居士」的交往，有勝國王孫與「遺老」「舊臣」的關係在內。

三、關於日本人永源藏本「寄八大山人函」及「大滌草堂圖」的眞僞問題。

解答：筆者相信此二者均係大千居士之戲作。除了在書法和畫法上尋出跡象之外，另有一項重要而顯著的證明：即是在大千居士的心目中，石濤與八大山人同爲明宗室，但石濤的輩份高於八大的輩份。（參見五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央日報揭載大千居士對記者之談話。）因之他所戲爲的永源藏本大滌草堂圖，八大山人對石濤稱「極老宗翁」石濤在是圖的題跋中則稱八大山人爲「家八大」。永源藏本寄八大山人函，僅稱八大爲「雪翁先生」。（按大風堂藏本爲「雪翁老先

生」，多一「老」字，具見分寸。）

四、關於大風堂藏本「寄八大山人函」，「石濤研究」作者鄭君說：「張氏係李梅菴先生的學生，師弟各藏一本，這是很奇怪的事。」

解答：筆者以爲並非師與弟各藏一本。因爲日本畫家橋本關雪所著的「石濤」一書，雖曾著錄此函的「日文譯本」，但未將原函印出，且函中文句與後來開公的大風堂藏本有不同之處。橋本是否曾見到此函的原蹟頗成問題。至於大風堂藏本之眞僞問題，涉及的問題較多，擬另文論及之。

五、方先生轉述徐復觀先生函，向筆者提出兩個問題：

其一：石濤五十孤行冊，題詩中有「戒行全無趨小乘」句，但小乘特重戒行；且石濤在何處有戒行全無之痕迹？而石濤爲僧說法，曾見於五燈全書。

解答：①梵語摩訶衍，譯言「大乘」，乃對小乘而言。法華經：「若有衆生從佛世尊聞言信受，勤修精進，愍念安樂無量衆生，利益天人，度脫一切，是爲大乘。」「小乘」，乃對大乘而言，法華經，方便品：「若以小乘法，乃至於一人，我則墮墜果，此事爲不可。」如果拿淺俗的話來勉爲解說，則「大乘」不獨「渡己」還必須無盡期的「渡人」。大乘法的要旨，在於修持者先有超脫世間的大覺悟，以「菩提心爲因」；而後以「護念衆生的大慈悲，以「大慈悲爲本」；施其適應世間的大方便，以「方便到究竟」。且不住涅槃，不僅今生今世，且盡未來，乘願再來；不僅此土此世，且入地獄，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眞是大哉抱負！「小乘」則反是，小乘以了生死爲因，離貪愛爲本，滅盡爲究竟。易言之重在「渡己」。近乎「自了漢」！石濤在詩中所謂「戒行全無」乃自悔其未繼續不斷地修其「大乘」，尤其到了揚州，昔日開堂說法等均成爲陳蹟，而

今竟以畫僧的身份到了京城，周旋於滿清名公巨卿之間。石濤早年是強烈的民族意識的，往後似乎逐漸泯沒了！其內心之沉痛又如何呢！石濤不止在此時此地自嘲爲「小乘」，他早在康熙二十九年，壬戌、一六八二年，過石頭菴山水冊頁上，就曾吟有「小乘客」的長方印。亦常自署「小乘客濟」（道濟畫展目錄一一六），足見「趨小乘」也好；「小乘客」也好，不是別人替石濤妄加的，乃石濤「夫子自道」。總之，從「南京末期」而「揚州期」，石濤已非「五燈全書」所記「開堂說法」的禪僧石濤，而是畫僧石濤了。

其二：石濤字變體太多，能指定何種字體爲石濤之定體而求助於科學的求證？

解答：①石濤的字體確有多種，不能說「太多」。從古到今的書畫名家，大多數兼擅衆體，沒有只寫一種「定體」的。書法端凝厚重如顏真卿，雖有「多寶塔」、「麻姑仙壇記」的正書，也有「祭姪稿文」的行草。即以近代草聖于右老而論，其書體的變化可說已達「神奇」之境。但有識者仍能確認無訛。②石濤的「字」如願意求助於「科學」以鑑別眞僞，不是難事，在石濤傳世的真蹟中，各體俱備的如像「清湘書畫稿」（神州國光社有影本），如像方聞先生所藏的書畫對題小冊（見道濟書展目錄），此二者中石濤的字體大都具備，不妨用之以爲測度的標準。石濤「宣城期」、「南京期」、「揚州期」字蹟容有變化，但仍萬變不離其宗，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說：「石濤的書法甚多變化，但多出於隸、碑，而運以縱恣。」（見徐先生「石濤畫語錄」中的「一畫」研究）「實事求是」的辦法，似乎比所謂「文字考證」法有效得多。③筆者深信石濤的字，不求助於科學也能辨別眞僞。但此話只能爲知者道，不可與「雅」人言！